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Research Collection School Of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9-2019

An interview question that brought about some thoughts

Zhengxiao WU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zxwu@smu.edu.s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e_research



Part of the [Econometrics Commons](#)

Citation

WU, Zhengxiao. An interview question that brought about some thoughts. (2019). *Lianhe Zaobao*. 20-20.
Available at: 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e_research/2293

This New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t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Research Collection School Of Economic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cherylds@smu.edu.sg.

思维空间 吴正晓

一个访谈问题引发的一些想法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里，英国记者梅迪·哈桑（Mehdi Hassan）问中国学者张维为一个尖锐的问题：How many Chinese lives could be lost or would have to be lost to justify a single percentage of economic growth? 中文的大概意思是“每年为了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愿意牺牲多少条人命？”张维为没有正面回答。

对政治学家来说，很难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任何数字答案都是没有人性的回答。当然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问美国前总统小布什：How many Iraqi/American lives could be lost or would have to be lost to justify the aim to disarm Iraq? 中文大意：“为了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可以牺牲多少条伊拉克/美国人命？”

或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How many Iranian/American lives could be lost or would have to be lost to justify the aim to denuclearize Iran? “为了伊朗无核化，可以牺牲多少条伊朗/美国人命？”

如果硬要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考虑量化一个决策的合理性。比如看这个决策是否能最大化一个人群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简称LEB）的总和。也就是说，一个决策合不合理，我们看它是否能增加一群人的总预期寿命。（在微观经济学里，这实际上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效用函数被我们定义为一群人的总预期寿命。）

举个例子，使用这个标准，我们看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民的

影响。1991年，苏联解体。1988年，俄罗斯人预期寿命是69.46岁，到了1994年，俄罗斯人预期寿命降为64.47岁。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人均预期寿命大约从70岁减少五年，即大约减少 $5/70=1/14$ 。俄罗斯1.4亿多人口，所损失的总生命时间相当于1000万新生儿丧生。如果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承担万分之一的责任，相当于他要承担1000个新生儿的死亡负责。尽管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很多的俄罗斯人民对他评价并不高。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

使用总预期寿命作为我们问题的效用函数，好处是比较直观，但显然有很多不足。比如说这个标准只看生命长度，没有看生命质量。在这个标准下，年轻人的生命比老年人的生命更珍贵，因为年轻人剩下的生命时间更长。同样道理，健康人的生命比患绝症的人的生命更珍贵。杀死一个预期寿命70岁的新生婴儿，等同于14个人少活五年。

人群的选取，取决于决策者的立场。假设一个美国总统需要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时，他可能会考虑这个人群为全人类，或只是全体美国人。不过显然当美国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所考虑的人群不是广岛或长崎的日本人民。

当李登辉提出“中国七块论”的时候，他心中的人群可能只是台湾人民。然而，有苏联解体这个前车之鉴，中国大陆强烈反对“中国七块论”的主张，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拥有14亿人口中国如果重蹈苏联的覆辙，人均寿命减少十四分之一，这等同于

杀死1亿新生婴儿。而且不是没有更坏的可能，因为苏联解体至少是和平的，没有内战爆发，而南斯拉夫解体引发了好几场内战。

回到开头的问题，“每年为了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愿意牺牲多少条人命”。如何得到一个数字答案？用计量经济学的思路，可以收集各国各时期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估计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对应多少预期寿命的增加，然后就可以给出一个数字答案。假设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对应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天，中国14亿人对应增长的寿命相当于救活了大约5万新生生命（预期寿命76岁）。

可以想见，相对于富裕国家，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国民寿命的正面影响更大。也就是说，按照最大化总预期寿命这个标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政府决策应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中国对进口外国垃圾的态度变了？一个解释是，当收入提高后，经济增长对国民寿命的正面作用，已经不能抵消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所以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性增加了。

生命权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一项。各国人权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是看人均寿命增长。如果人权组织支持使用人均寿命的增加来评估政策，他们一定会强烈支持美国禁枪。禁烟限酒也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大的帮助。而死刑的取消，则未必总是人权的进步。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
经济系高级讲师